

我獻身稅務的經過

(本文插圖刊第23頁)

金唯信

不進銀行不搞稅務

民國三十四年六月我在重慶沙坪壩中大經濟系畢業，立刻面臨的問題是就業。當時經濟系畢業的人最好的出路是進銀行，特別是進國家行局，包括中央、中國、交通及農民四家銀行，和中央信託局與郵政儲金滙業局，也就是當時社會上通稱的四行兩局。要進國家行局，必須先考銀行人員訓練班，考取受訓一段時期，方才派在各行局做行員，因為要進國家行局的人很多，所以要通過這個考試而獲錄取，並不是很容易。第二個出路是進稅務機關，不僅機會多，而且不要經過考試，比進銀行容易多。

我當時的打算是既不進銀行，也不進稅務機關。

不進銀行，是因為眼見對日抗戰即將獲得最後勝利，國家成爲四強之一，建設百廢待舉，學經濟的人必多更有意義的報國機會，不願進銀行去做坐櫃檯點鈔票的機械工作。不進稅務機關則因戰時稅務極端不上軌道，聽說基層稅務人員風氣很壞，納稅人也多不走正路，大學畢業生初入稅務機構，要便同流合污，否則便會遭遇各種壓力，左右爲難。我因幼年時曾稍讀聖賢書，心

中似已有餓死事小，名節事大的觀念，爲了避免淌入混水，所以決定不進稅務機關。

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未久我獲得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機會，進了資源委員會甘肅油礦局工作，資源委員會當時是國營事業主管機關，朝氣蓬勃，人才濟濟。甘肅油礦局是現在中國石油公司的前身，戰時一滴汽油一滴血，也是規模龐大，前途無量的單位，可是我被派在會計處實習，此時該局已奉令辦理結束，準備改組爲中國石油公司，我們兩個中大經濟系和兩個政校經濟系畢業的新進人員，一連三個多月被派抄報表和寫鋼板臘紙的工作，以後忽又被派做會計業務中最困難的整理帳業務，六個月實習尚未期滿，我便決心要另謀出路。想到抗戰業已勝利，今後國家建設百廢待舉，財政工作必然重要，乃向中大央請系主任儲葆一老師函介，去見財政部稅務署副署長陳琮，陳副署長是中大經濟系早年畢業的老學長，我向他說明希望進財政部工作，陳學長告訴我，財政部正準備選都，不進用新人，如果我願到上海、南京、武漢或任何地方稅務機關，他都可以負責推介。我因打定主意不進稅務機關，所以當即婉謝辭去。接着又請儲葆一老師函介我去財政部普見國庫署長楊綿仲，綿公爲一老

派讀書人，出自湖南譚延闓畏公墓府，自視甚高，不稍假人辭色，不料我持函晉見，他却立即答應要我，只說沒有好職位給我，於是我便以委任四級科員職位，於三十五年二月進了國庫署，同年夏選都南京。

再放棄進稅務機關

選都南京以後，部內各單位低級職員升級至爲緩慢。有人告訴我，要想加快升級，除特別人事關係外，考高考或特考是終南捷徑。三十六年適逢選都後財政部第一次舉辦高級稅務人員考試，我便報名參加，結果在貨物稅組以優等第二名錄取。此時又有人告訴我，只要活動調任稅務署，便有升任薦任職務可能。我思之再三，仍然堅持中大畢業時的想法，寧可不升薦任職，也不願活動調職去做稅務工作，此爲我第二次放棄進稅務機關的機會。

三十七年底南京撤退，我隨部遷上海，不久再遷廣州，三十八年遷回重慶，約停半年撤往成都，席未暇暖，復飛海南島海口市，換乘政院疏遷輪船，於年底到臺北。政府播遷來臺初期，財政重心在臺省財政廳，財部同仁大多事務清閑，我在國庫署原係經辦歲入事項，此時更是無事可

做。韓戰爆發後，美國開始協防臺灣，我想局勢已轉危為安，應該力圖振作，於是重行找出英文財經書籍自修，每天上午並仔細閱讀兩份本地英文日報（油印版），遇有生字便查字典，遇有好的報導文章和社論，我便一人躲到辦公室外走廊裏去朗誦，久而久之，英文確有相當進步。

四十二年徐柏園先生調長財政部，財經界人士習稱他柏公。他畢業於中大商學院，是先進學賦稅署任專門委員，賦稅署正進行財部遷臺後第一階段的稅制改革工作，必立兄負責所得稅、遺產稅和印花稅部門業務，他正獨力主辦所得稅改制工作，手下缺少幫手，以致忙碌異常。必立兄在我進中大經濟系一年級時，他已在校任本系助教，每週選替教授為我們講解經濟學原理一小時，因此彼此早就認識。一天他來同我談，說他正從事所得稅改制，工作太忙，而我在國庫署無事可做，希望調我到賦稅署幫他的忙。我當時可能是閑得太久，確實認為在國庫署將難有所作為，因此未作太多猶豫考慮，便答應了必立兄，以科長名義調到賦稅署，在必立兄指導下辦所得稅和遺產稅業務，從此轉入稅務機關，深深陷入政府在臺灣努力從事的稅務革新工作。這是我自中大畢業以後，進政府任公職的一大轉捩點，而促成此一重大轉變的則是亦師亦友的學長楊必立兄。

考取聯合國獎學金

四十三年聯合國首次函請我國政府選派財政官員二人，以聯合國獎學金赴美國哈佛大學法學

研究院進修，財政部公開徵求同事報名參加甄選，楊必立兄與致勃勃，並來約我同去報名，我一聽是用聯合國獎學金去哈佛唸書，當然也躍躍欲試。只是自認學問遠遜必立兄，恐怕力有未逮，不免躊躇難定，必立兄則對我力加鼓勵勸勉，二人終於向部報了名。甄試之日，參加者約十餘人，部長徐柏園先生親自出一英文作文題，是關於歡迎韓戰反共義士來臺的事，我因為那幾年經常認真閱讀英文報紙，寫起來倒也頗感順暢。幾天後公布成績，中選的竟是必立兄和我二人。人事處並將考卷發還各人參閱，每份上面都有徐柏園部長親自用紅藍色鉛筆核閱的標記，因此雖然是中大出身的部長錄取兩個中大出身的部屬出國留學，當時並未引起任何認為不公的閒言閒語。

參與賦稅改革工作

四十四年八月我和必立兄聯袂赴美，進哈佛大學法學研究院報到入學，此時我才真正弄清楚聯合國指定我們來學的是財政政策和租稅立法。辛辛苦苦唸完一年後學成歸國，仍回賦稅署工作。四十七年財政部和臺灣省政府為改進稅務，聯合成立賦稅研究小組，我以業務人員身份參加，對直接稅制的改進略有建白，殿前部長家淦將我提升為專門委員，仍兼賦稅署科長。五十二年財政部政務次長周宏濤先生調長臺省財政廳，依賦稅研究小組的方案，成立稅務處，我奉調任省稅務處副處長。

民國五十七年夏行政院設立賦稅改革委員會，聘留美學人劉大中先生為主任委員，因大中先

生之邀請，我又奉調擔任該會第二組主任，負責配合外籍顧問，全面檢討我國內地稅各項稅制稅法，並草擬改進方案。五十八年七月李國鼎先生接長財部，他以基督的精神和校友的關係，將我再調回財政部接任賦稅署長，中經費部長驊和張部長繼正，連續任賦稅署長達十二年半之久。直到七十年代財政部長更換，我調任中央信託局，才擺脫稅務工作。計自四十二年由國庫署調賦稅署起，共在中央及臺灣省稅務機關服務達二十八年，而此二十八年也正是我的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間，以一個大學畢業時立志不進稅務機關的人，結果竟以一生中最美好最長的時光獻身給了稅務，關鍵人物則是楊必立兄、徐柏公和李國鼎部長三位中大學長。惟一可以自慰的是，我雖然放棄了當初不進稅務機關的志願，做了二十八年稅務工作者，但自認曾為改進我國稅務盡了一份心力，也堅守住了服公職的人應守的基本態度。

訂購「中外雜誌」贈送親友
 是最高級的禮品，他（她）
 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。全年
 新臺幣捌佰伍拾元，國外全
 年美金叁拾伍元，航空另加
 郵費，請撥電話：五三六六
 八六六。五三六四二〇六